

闽南文化三论

陈支平

近年来，学界对于闽南文化的界定及其丰富内涵进行了诸多的讨论，取得了有益的研究成果。当人们对于闽南文化的认知逐渐有了一些基本共识的时候，我以为进一步强调闽南文化的三大特征，还是十分必要的。

一 多源复合的血缘与文化认同

中国南方的现居民，一贯有着追寻自己的先祖渊源于中原地区的传统。这种传统，从积极的方面讲，是向往中华主流文化和中央政治的必然体现；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却是对于自身文化渊源缺乏自信心的无奈流露。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文化是兄弟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任何所谓纯正单一的文化形体，在中国的发展史上都是不存在的。长期以来，由于人们过多地强调黄河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摇篮，这就使中国南方人产生了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中原人是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真正传人。但是事实上，自秦汉以降中国的汉族形成以来，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相互融合就没有停止过。西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匈奴、鲜卑、氐、羌以及稍后的突厥等部族相继进入中原，到唐代以后，这些部族已大部分融入汉族之中，鲜卑、氐等部族名也逐渐在史籍中消失。两宋时期，辽、金南侵，契丹、女真、党项等部族进入中原，也逐渐失去原有的特性，成为汉族的一部分。明清时期北方部族融入汉族并且逐渐消失本部族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可以说，所谓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核心说法，完全只是一种想象而已，历史事实不是如此。

中国的南方人，虽然极少与北方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直接发生关系，但是南方人的民族融合有其自己的特征。汉唐以来，固然因为北方的战乱而造成许多北方人民南移，成为现在南方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另一方面，原来最先居住在南方各地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越族，也在与北方移民的冲突融合中，绝大多数成了现在南方汉人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对于福建以及南方移民的研究，只是建立在想象推测的基础上，我们并没有十分充足可信的资料说明究竟北方的移民在现在南方人中占有多少的比例，早先越族等土著少数民族占有多少的比例。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现在的南方人是由南来的北方移民和原先土著少数民族共同形成的。

闽南作为中国南方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血缘和文化构成与福建其他地区有着许多相同之处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们还不能忽视海外血缘和文化对于这一区域的影响。自唐宋以迄元代，阿拉伯人在闽南特别是泉州一带，延续活动达数百年之久。他们对于泉州地区乃至闽南地区民间社会的影响，既有血缘的混合，也有文化的感染。尤其是在宋末元代，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阿拉伯人成了泉州的统治者，依附于政治的文化习俗，也必然造成这些地区主流强势的价值取向氛围，从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虽然到了明代以后，阿拉伯人及其文化的影响急剧消退，但是民间社会一旦形成文化习俗，形成了地域人文特征，那么政治的冲击力就不能不大打折扣。这样的血缘和文化的渗透，将在区域的历史长河中发挥深远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探讨闽南文化的时候，闽南文化所体现的有别于中国北方以及南方其他地区的多源复合，并且由此而来的闽南人文特征，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二 边缘化的文化价值解读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疑都会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和骄傲。然而我们还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华文化既有早熟又有不成熟的发展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化日益呈现出它的凝重性格。

早在先秦，中国已有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想，一直为人们甚至西方人所称道。但是这种理想却得不到正常的发展。由此而派生的平均主义思想，一方面成为农民反抗压迫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加剧了中国历史稳定与动乱的恶性循环。中国科学技术的发明进步历程也是如此。秦汉以后，知识分子大多陷入“经解”的泥潭和科举的漩涡，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缺乏应有的重视。因此，尽管中国有四大发明以及一系列的科技贡献，但这些创造、贡献始终未能成为社会前进的主流。许多科技发明无法得到社会的推广应用，往往出现中断、失传的现象。

中国农耕经济和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相互配合，加强了传统社会的坚韧性。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过渡到后期，中国文化日益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宋元以后，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格，较之汉唐已有明显的衰退。明清之际，有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关注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科技文化，但同时更多的人是被无端地拒之门外。拒绝者的理由，是认为儒家文化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这种文化上的保守性，是中国明清以来社会长期迟滞不前的根本因素。

如前所述，包括闽南人在内的福建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渊源于中原的人文传统，这一方面说明福建人、闽南人对于中华主流文化的向往，但从另一种角度而言，未尝不是人文边缘化的一种自我安慰。人文的边缘化固然可能产生某些自卑的文化倾向，但是当中华主流文化日益趋向保守的时候，这种边缘化的文化却往往由于地理的因素，较少受到这种保守性格的冲击和影响，从而能够更多地保存中华文化中较有开拓进

取的优良成分以及自身的一些独特的传统。这正如我在《福建六大民系》一书中所写的：“唐宋以来，以中国政治中心为代表的中华主流文化，随着历代政治专制体制和人文格局的演变，日益显露出凝重和保守的性格，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理想文化更加空泛保守，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生事物的萌发和成长。而处于边陲地带的福建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华主流文化的影响，但是福建较为独特的人文结构和山高皇帝远的地理位置，又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主流文化的强制性影响，或者说较少受到了中国政治中心日趋空泛保守的社会习气的影响，从而为福建地域文化的演化留下少许自主发展的空间，甚至出现某些背离政治主流文化和中央专制统治的倾向。正因为如此，福建地区才能在宋明以后仍然出现一些在政治主流文化的评判下属于异端的思想文化学说，才能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环境里，出现文化学术异军突起的局面。而福建民间人文性格中所保存的那种开拓进取、不畏艰险，敢于犯禁的作风，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福建地域文化所包含的某种离经叛道、抵御大一统专制的意味在内。”毫无疑问，我的这一论说，更多的是体现在闽南人的身上。

三 会通华洋的文化补强意识

近现代以来，人们在诟病中华文化日趋凝重保守的同时，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佩服原本与中国有着许多文化渊源的东邻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人们在探究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时发现，日本文化善于吸收各种有利于自身发展进步的外来文化。这与清代朝野上下所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盲目自负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明清以来中华文化的凝重保守倾向，不仅体现在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消化上面，而且在不同的区域之内，也往往形成许多自我陶醉、自我封闭的现象。文化意识的保守封闭是造成中国近代社会迟滞不前以及国家落后挨打困境的重要因素。然而反观福建地区特别是闽南地区，这种文化的封闭性就相对淡薄。就以文化的表达形式——语言的认同为例，直至今日，中国各地的许多地区仍然以自己的方言为自豪。京津地区以及华北地区，由于是国语即普通话的发源地，这些地域的语言值得自豪是可以想见的。除此而外，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沪语的运用几乎成了通行话语，外地人到上海，常常感受到不懂沪语的处处艰辛。中国西南地区，素有西南官话的美誉，这些地区也无不以讲西南官话为自豪，甚至出现本来可以讲普通话而偏偏操西南官话的现象。影响所及，连电影、电视也纷纷模仿西南的名人而满腔西南官话。即便是与福建省同为“百越纹身地”的广东省，更是以讲广东话并且带有一些香港腔为自豪，外地人到广州，经常会因语言的障碍而有如身处异域之感。

地方语言的自我陶醉，一方面是形成地方文化的一种主要因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种因素未尝不是中华文化保守性格在区域文化上的一种体现。在中华文化一体化乃至世界文化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的现代社会里，地方语言的执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排斥通行语言的普及，本身就反映了地域文化的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是与中华整

体文化的排他性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可以说，在中国众多地方语言的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氛围中，福建特别是闽南地区，是中国少数一些不以地方语言为自豪的区域之一。在中国的众多方言当中，闽南方言的影响力并不比广州方言的影响力小，目前世界上使用闽南语的人数也不比广州话少。但是闽南人从来就没有认为闽南语是一种值得自豪的语言，相反，闽南人以至其他地区的福建人，常常因为讲不好普通话而感到内疚。闽南人对于外地人，一般都希望能够与之进行良好的沟通，而较少心存用闽南方言为难外地人的心态（对于官府的情景除外）。虽然这种沟通由于种种原因有时显得比较艰难。

闽南人对于语言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对于自身文化的开放心理和对于外来文化的接纳意识。正因为如此，闽南人在发扬自身文化优点的同时，也较为注重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从而使自己的文化得到补强和升华。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与海外交通的历史十分悠久，这就使得闽南人的文化补强，并不仅仅限于吸收国内其他区域的文化长处，同时也能够从海外的优秀文化中得到营养。这也正是闽南人祖祖辈辈不论在怎么样的艰难险阻之下，依然如故地走出海洋、走向世界的动力所在。

文化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是导致文化衰败的内在原因，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相比，闽南文化较少这种自我陶醉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勇气，这是闽南文化走向世界的根本保证。这个优点，无疑需要我们闽南人加以认真的记取和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